

揭开历史发展之谜

——『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高新军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揭开历史 发展之谜

《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高新军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揭开历史发展之谜:《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高新军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ISBN 7-80109-558-8

I. 揭... II. 高... III. 《资本论》—马克思思想研究
IV. 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468 号

揭开历史发展之谜 高新军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h t t p://www.cctp.com.cn

E-mail:cctp_edit@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56 千字

印 张:7.5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00 元

前 言

本书的观点最早出现于17年前。那是1984年,我还是一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正在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硕士学位。选择这样的题目来作我的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是我自己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问题思考的一次总结和清算,也是我对当时经济和政治改革现实问题思考的一种阶段性结论。但是,这种选择对我确实又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开始时,我几乎不知从何下手。不仅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著作浩如烟海,其中不少还艰深晦涩,而且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少得可怜,尤其是从我所选择的角度来看,几乎是空白。但喜欢面对挑战是我的一贯风格,在导师的指导下,我潜下心来,一步一步地摸索,最终完成了它,并在毕业论文答辩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老师的一致好评。

应该说,将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写到十几万字的情况,当时就并不多见,现在就更几乎没有了。我当时写作时也并不是打算只写一篇论文,而是按照一本书的架构来构思的。目的就是想比较完整地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说出来。可以说,我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当我想找个出版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时,遭到了冷遇。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和学术界都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气氛,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

自然就排不上位子。好在我最终还是把该书中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形成的两个部分抽出来，单独在两个杂志上发表了。之后我几次出国学习，历时数年，又担任了《经济社会比较杂志》编辑部主任和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比较处处长，大量的杂志编辑和行政工作，使修改出版这本书的事情就一下子拖了下来。2000年4月底，当我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归来后，已摆脱了大量行政工作的我就又一次把出版书的事情摆上了议事日程。

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又重读自己当年写就的书稿时，不禁为自己当年在研究这个问题上的精辟分析所折服。看来，我的研究方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新的材料，也使我可以从更高和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这个我一直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我清醒地看到，虽然至今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比较十几年前已是数倍之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基本理论的研究上，尤其是将马克思的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运用于相互交融的不同学科的理论研究方面，我们仍未出现突破。至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大多是一些从具体到抽象的工作，而标志着一门学科有重大进展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工作，至今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课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研究就是从今天看来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种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把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案例，揭示了马克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用研究的方法来寻找自己的理论基点，又如何用叙述的方法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而揭示人类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在这里，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方法又一次明示我

们,真正研究应该如何去做。

—

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方法是从它的历史开始。同样,要知道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主题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也只能从我个人的经历开始。我感到,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被动地服从于某种外部的安排,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再慢慢地对这一主题产生兴趣,继续走下去;另一种是在学习和研究中碰到了困惑自己的问题,从而下决心把解决这种困惑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在解决这种困惑中提升自己认识水平和能力。我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就属于后者。

我出生在南京、一个军队高级干部的家庭。家乡这个概念只存在于我每次填表的“籍贯”栏里,因为我确实至今还从未回过我父亲的那个老家。在我成年以前,我已记不得我们搬过多少次家了。只记得小学我上过3个学校。那么中学呢,很遗憾,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错误地打倒,在那种凭成份上学的年代里,我受株连而被当时执行极“左”路线的军管会领导的中学拒之门外。1968年10月,年仅15岁仅仅小学毕业的我虽然不够下乡插队的条件,但面对着在当地处处受歧视和打击的恶劣环境,我主动要求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去了。在小学里我一贯品学兼优,我希望人们能够通过我自己的表现来判断我这个人的优劣,而不是仅仅看我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之后,我当过农民、士兵、工人,但从1970年开始,我逐渐地感觉到我的文化水平成了我继续提高自己能力的巨大障碍。以后的每次填表中的文化程度一栏,“小学毕业”

这几个词都深深地刺痛着我，从而也使我产生了一定要发奋图强，改变自己目前状况的动力。可以说，我比自己的同龄人有更曲折的生活经历，走上社会更早一些，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我也具备了比我的同龄人更强的承受打击的心理能力，不屈服于失败和逆境，认准目标一直努力下去的决心和意志力。现在回想起来，它构成了我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面对巨大挑战锲而不舍坚持下去的基本素质。

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学习《毛泽东选集》开始的。当时对毛泽东盲目的个人崇拜使我真的认为他的书就是“圣经”，一句顶一万句。在偏僻的大别山农村昏暗的煤油灯下，没有任何人的监督，我每天晚上都在学习《毛泽东选集》。那是带着一种“句句是真理”的崇拜心情在学习，至于领会了多少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就天知道了。记得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1970年底，我来到了部队，正好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7本书。我就立即买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革命和“左”派幼稚病》等书，一本一本的认真地读。说实话，以我当时的理论和文化水平，能够看懂的只是书中的中国字和个别口号式的结论，其他就不甚了了了。记得毛泽东曾说过，在老百姓和军人之间，并不是隔着万里长城，只要认真学习和实践，就会很快实现这个转变。我在这个转变中，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同时产生了使自己要一直研究下去的最初动力。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使我成为了部队的一名理论骨

干,参加了不少理论学习班和培训班。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并使我获益匪浅的是当时师政治部组织的学习《论马克思》、《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列宁》的理论培训班。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二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在当时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我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马马虎虎,但对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怎么也搞不懂了。什么价值、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价格和平均价格、生产价格;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等等,只对计划经济还一知半解的我,当时头都被搞大了。虽然学习笔记记了几大本,发的书上的空白地方也都被我写的注释填满了,但真叫我讲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是一知半解。这在当时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潜藏着我在今后一定要把这个理论问题搞清楚的萌芽。

转眼几年过去了,1977年3月从部队复员回到地方后,我在工厂当了2年工人,1978年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进了安徽劳动大学(后转到安徽大学)政治系的哲学专业,成为了一名大学生。之所以考文科,一是由于自己没有上过中学,数理化全部靠自学难度太大;二是自己对理论有兴趣,在部队还是理论骨干,有一定的基础。在大学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逻辑学这3门课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也给我留下了不少悬念,恰恰是这3门课我的考试成绩不太好。我当时的感觉是,这3门课里的许多问题,我当时并没有真正弄懂,而是一知半解,这也正是我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原因之一。那么这3门课都给我留下了一些什么悬念呢?

黑格尔的逻辑学讲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而我们在

认识论中则很少涉及这一内容。那么,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到底在认识论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是我要搞清楚的。我在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这一内容。但对这一问题的真正解答,我是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文章“从认识的系统看认识过程的统一”(载《南京大学学报(研究生专刊)》1985,8)中完成的。后来又写了“对个体认识结构的探讨”(载《争鸣》1987,3)等文章。

由于过去在部队的理论培训班里,对政治经济学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所以在大学里学习这门课也有一些畏难情绪。学习是一个由薄到厚、又由厚到薄的过程。这在认识论上,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我在大学里学习政治经济学看来只完成了前一个过程,后一个过程则完成的不好,或者说,没有完成。马克思为什么要从单个的商品分析开始,为什么它包含着以后全部发展的萌芽,它和历史的发展为什么就是一致的,这种叙述方式在逻辑和历史的一致上有什么优越性,它和人类的认识规律之间有什么联系,等等,都是我当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直到1994年秋,在读研究生期间,我通过一年多的系统学习才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在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系列讲座活动中,我主讲了“资本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一主题,算是对过去一直困扰着自己的这一问题的一次清算。我的讲座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形成的文字收入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一书中。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上,不知是原理的教学方法问题,还是枯燥抽象的理论无法使人产生兴趣,这门课缺乏历史感。其实,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问题不在于论述了阶级斗

争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于发现了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论述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如何推动历史发展的。我直到后来读研究生时才深切地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是密不可分的两门学科,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逐渐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马克思之所以要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则与他所继承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当他发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只是在神话和合理化现存的不合理时,他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当他发现将现有和应有简单对立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变成了对现实的辩护时,他才懂得要从肮脏的现实和经济学出发,来探索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当然这些认识是我后来在写作这本书时才阐述清楚的,并体现在我后来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从马克思探寻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点的过程看哲学和经济学的交融发展”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4;“探索科学基点的道路——简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前提的创立过程”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2)

1982年7月,我从安徽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就是论述认识论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的。一年后,我考入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孙伯鍨老师的指导下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硕士研究生。孙老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对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史的研究就是今天也是无人企及的。受教于他,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创立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为了加强自己经济学的功底,我选修了大量经济学的课程。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我基本弄清了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逻辑学、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相互交融的关系,为自己写作本书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二

我是直到后来,才真正懂得了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在方法论上的巨大意义的。其实,马克思在40岁之前,已经完成了他的两个重大发现。但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则到了他近50岁的时候。我是在自己刚刚21岁的时候接触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但我对马克思方法论的真正理解和在研究中较为自如地运用则要迟得多,差不多也要到了近50岁的时候,最明显的证明有二:一是我在2001年完成的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课题,是至今为止我最为满意的(其成果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同时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和收入由国家民政部和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举办的2001年“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是本书直到今天我才感到出版它的必要,并要为它写一个自己如何从方法论上掌握这一理论的前言。对此,我的理解是,前人的著作是在其长期的知识积淀中厚积薄发形成的,后人要想真正理解它,也必须有相当的知识积淀作为基础,这种积淀不光指纯粹的书本知识的积累,这可以在学校中完成;而且包括在研究和实际操作中的实际经验的积累。只有当你的知识积淀达到相当水平以后,你对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才能心领神会,融会贯通。

实际上,我在开始对本书的主题进行研究时,就碰到了方法的问题,或者说是整个书的结构问题。从认识论来说,人们认识总是从具体开始的。我当然也不能例外。首先进入我的研

究视线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在这个被别人已经挖掘过的领域，我所要做的工作是发现其中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而不仅仅是叙述这个理论被发现的过程。其实，包括现在的许多研究，仅仅从大量的现象中概括和归纳出一些普遍的现象，从而形成一个个的理论的点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能够在这些概括出的点之间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它们由此及彼的发展规律。我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在继承前人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中，经历了两次的思想转变，最后通过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了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从而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原因。马克思的这两次转变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

马克思的思想起点是他出生在一个律师的家庭里，并从小受到他所处的环境中的民主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代追求自由思想的他会很容易地受到当时在思想领域中自由驰骋的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影响。运用辩证法的方法，他可以在黑格尔的精神领域里很方便地实现他的自由理想，当然，这种实现是不会触动现实不合理状况的一根毫毛的。因此，只要这种精神哲学一碰到要对现实的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就必然漏洞百出，这也正是马克思在试图回答林木盗窃的实际问题时所遇到的尴尬。这里隐含的矛盾在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和现实之间是一种应有和现有的对立，仅仅在思想上想当然地把这种对立消除掉，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不能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其实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当年的马克思有，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谓的“精神胜利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普通老百姓的“精神”只是一种被动的自我安慰和不具有黑格

尔哲学的思辨性罢了。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论之所以对马克思是一次巨大的震撼，是他终于找到了黑格尔哲学之所以不能解释现实的原因。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而现实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思想和绝对理念里去弥合应有和现有之间的矛盾，从而让不合理的现实继续存在下去，而是用异化理论去批判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使社会回到合理的状态中来。费尔巴哈只是把异化理论用于批判宗教，马克思则用它批判了所有他认为不合理的东西，从而把异化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但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很快就发现了人本学的异化理论的致命缺陷，因为它并没有找到一条从现有发展到应有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看到了异化理论仍旧是把现有和应有对立起来的另一种理论模式。它虽然可以指责现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有哪些地方不合理，但是第一，它无法区分人和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的阶段性，从而没有办法将人和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承上启下的作用展现出来。第二，简单的批判并不能改变现实的一切，社会不可能一步登天，到后来，这种激奋的指责只会成为人们无所作为的借口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其实，当前社会上许多人的思维方式仍旧是如此。常听人们说这事应该是怎么怎么，而现在又是如何如何。因为将现有与应有对立起来进行比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找到一条现实的由此及彼的道路。不过，这种思维方式较之“精神胜利法”有了一些进步，主要在于它从向内的自我安慰转向了向外的批判，从不触动现实转变为对现实的积极干预。

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他的第二次转变。他终于

明白了要从肮脏的现实出发,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出发,来说明人们行为的特征,说明社会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而这一切,都要从研究人们衣食住行的经济学中去寻求答案。正是在这种研究中,马克思逐步接近了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最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未发表的著作中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出了经典的表述。

总起来看,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在过程的终点,马克思找到了其理论的基点和立足点,这个基点显然已经包括了他在此之前所经历过的认识阶段的成果,具有了以后一切发展的萌芽和出发点的性质。如果这时马克思就停止了理论上的探索,没有接下来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过程,没有他运用这一理论工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没有他的经济学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就不可能在人类思想史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有今天这样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是要找到一种解剖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而这种工具是否科学,则是需要通过对于现实的批判来证实的。由此看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进行批判就是必然的选择。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我所使用的方法是与历史上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认识和历史的一致本来就是已被证明了的科学规律。所不同的是,我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发现了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并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阶段性成果,以及这种成果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实,不光是马克思,就是任何一个人,其思想的发展和转变

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在这里研究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讲述我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项研究,以及在研究中为什么要用这些方法,等等,这本身也是在研究着另一个个体的认识过程。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研究具有普遍的意义。

如同马克思一样,如果我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那就不具备完整性,而且也没有真正揭示出《资本论》中经济学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真谛。恩格斯曾说,《资本论》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其中的结果。那么,如何来构建这个科学的大厦呢?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在这里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就是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的区别。

在我以前接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典的表述就是那么几句话。显然,这无论从理解的角度,还是从运用的角度看,都远远是不够的。过去我们更多地把《资本论》当作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来看待,至多承认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用其中,而较少把它同时当作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来看待,它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抽象的结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完整整体。要在我的研究中再现这个整体,就必须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那样,用叙述的方法,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阐述,从抽象到具体地逐步展开,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经济学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体系。

三

古往今来,关于社会的发展是否有规律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的确,历史事件的纷繁复杂、曲折多变,历来是思想家、艺术家发挥充分想象力的乐园。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但研

究者则可以对发生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突发事件做合理的假设:如果当时事件的发展是另外一种情况,可能历史就要被改写了。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其实,人们研究历史,一是要以史为鉴,少犯或不犯历史上人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二是要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后一方面,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第一次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规律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在现实中,政治家们有时是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也有时则是不自觉地必须按照这个规律办事。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意识形态之争。记得1982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时,经济一片萧条,处于滞胀状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为必然。里根奉行“供应学派”理论,实行减税,三轮下来,减幅达30%以上,在艰难地熬过了长达1年半以上的政策实施与经济有所反馈的时滞之后,到1984年,美国经济一举突破了几十年来长期徘徊的滞胀局面,那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的惊人水平。从那时至今,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阴影,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里根当时就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认为只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时,美国和日本在企业的竞争力上的差距日益明显,日本终于在综合竞争力上超过了美国。但在高技术领域,美国政府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宽松的环境,副总统戈尔亲自为互联网的发展撑腰打气,加之美国企业努力向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学习,从而创造了战后美国经济最长的增长时期,一举又夺回了世界综合竞争力第一的位子。这又是一个

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例子。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就更是这方面的范例了。

在历史上,马克思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后,第一次把它应用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工人从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到实质上隶属于资本的过程,表现为建立在以上矛盾运动基础上的各种虚拟的经济活动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活动。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逻辑,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为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出现,创造着条件。所以,《资本论》不仅是一部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性著作,更应当看作为一部对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解剖性著作。它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历史发展之谜。

从那时至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其矛盾运动也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从生产力来看,人们不再简单地重复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这样的三要素,而是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三要素内部和其相互联系的复杂关系中。这要归功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对环境的新的认识。现在我们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本身来说,是要研究企业内部的要素组合形式和企业治理结构。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关注两权分离,把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界定清楚,而且要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那种把劳动者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方法已显得过于简单,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劳动者身上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它内在化于个体的劳动者身上,使这种劳动者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和货币